

沙 心

Herz aus Sand

Daniel Goetsch

尼尔·戈奇 著 陈巍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心/(瑞士)戈奇(Goetsch, D.)著;陈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1

(瑞士当代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Herz aus Sand

ISBN 978 - 7 - 5327 - 5626 - 1

I. ①沙… II. ①戈…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瑞士—现代 IV. ①I52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7542 号

Daniel Goetsch

HERZ AUS SAND

© 2009 by bilgerverlag GmbH, Zürich

本书得到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资助

沙心——瑞士当代小说译丛

[瑞]丹尼尔·戈奇/著 陈巍/译

责任编辑/裴胜利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顛輝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37,000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626 - 1/I · 3301

定价:2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严重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 - 57602918

总序

今年春天上海世博会开幕期间以及在今后的几年里,瑞士文化基金会(Pro Helvetia)精选的瑞士当代优秀德语作家的文学作品将陆续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个文化交流项目在瑞士文化基金会安·萨尔维斯贝格(A. Salvisberg)女士和柏林文学研究会(LCB)乌·雅内茨基(U. Janetzki)博士的倡导和支持下得以实施,中国读者将会在这个当代文学系列中充分感受今天瑞士德语文学中所蕴含的鲜活的文化记忆,体验当代欧洲社会生活的多棱面折射,感悟世界各地同时代人的情感和命运。

说到瑞士的德语文学,我们很快就会想起在苏黎世家喻户晓的高特弗里特·凯勒,想到他的《绿衣亨利》和《马丁·萨兰德》。凯勒在他的小说中,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向世界展现了位于阿尔卑斯山中心地带这个小小的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历史画卷,描述了个体在社会形态变异中的历程。凯勒19世纪就已经为瑞士德语文学奠定了在整个德语文学中的重要

地位。

20世纪的瑞士德语文学群星灿烂。他们中间不仅涌现出了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施皮德勒、黑塞那样的经世作家，也蕴藏着像罗伯特·瓦尔泽那样鲜为人知、却又充满神秘和狡诡的现代主义文学家。著名的文学双子座迪伦马特和弗里施更是为瑞士德语文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这些作家在中国都有广泛的译介，深受中国的外国文学爱好者的喜爱。然而，我在这里使用的“瑞士德语文学”概念却蕴含着某种悖论，因为这个概念本身说明了瑞士德语文学在存在中的不存在，或者说是在不存在中的存在。

我们若用罗伯特·瓦尔泽语调来说，假如有一种文学叫做瑞士德语文学，那么它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渺小得几乎就像片片飘逸的雪花，然而正是这片片雪花所含有的巨大力量，染白了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脉。对于任何一个瑞士人来说，地球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二都是国外，因此毫不奇怪，20世纪以来的瑞士德语作家几乎都必须融入整个德语地区，或者融入整个世界。洛桑的文学理论家彼得·冯·马特曾经说过，瑞士德语文学是一种语言区域文化相互作用下的某种效应，瑞士籍的德语作家若要成功，那么他们必须在其他德语国家得到认同，在那里摘取文学的桂冠。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仅有五百万德语人口的瑞士无法为德语文学的接受提供足够的疆土和阅读人口，如果说要对瑞士德语文学做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它首先是属于德语的，其次是属于德语国家的，再者是属于欧洲的，最后则是歌德意义上属于“世界文学”的，因此它也是属于瑞士的。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近当代瑞士德语作家的身份和存在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们创作的视角、涉及

的主题以及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情感世界、生活和命运都远远地超越了瑞士的疆界。

过去如此,今天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

2008年初夏,我和宁波大学的陈巍,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壮鹰、张帆,浙江大学的李张林等诸位同仁应瑞士文化基金会和柏林文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瑞士当代德语作家的译介和文学交流项目。2009年的初春时节,我与几位同仁去了苏黎世近郊小村,一个叫“罗伦译者之家”(Übersetzerhaus Looren)的地方,目的是与几位当代瑞士颇有成就的中青年作家进行一次面对面的交流。那次我们还有幸与柏林文学研究会的雅内茨基博士一起专程去苏黎世拜访了瑞士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记者、国际社会活动家胡戈·罗切尔(Hugo Loetscher)。其实,罗切尔应该算是迪伦马特和弗里施那个时代的作家,或者说也是积极介入瑞士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那一代瑞士知识精英,他的早期作品如《污水》(1963)、《编花圈的女工》(1964)、《大橙子里的秋天》(1982)等均具有强烈的杜会批判和讽刺特点。

那一年春天雪很大,罗切尔的手摔伤了,他的右手缠着石膏和绷带跟我们见了面,在苏黎世老城区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文学往事,他的步履有些缓慢,他告诉我们前几天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手骨折了。那天晚上,他邀请我们在苏黎世内城的一家古罗马风格的饭店里一起用了晚餐。遗憾的是那次见面是我们最后一次聆听大师的教诲,就在那年8月,罗切尔不幸与世长辞。当时他正在阅读总结自己一生的自传《我的时代是我的时代》(2009)一书的样书,现在想来,这个不带问号的书名既是他对自己一生的自信,也是对

历史和未来的焦虑。他的去世无疑是德语文学界和瑞士知识界的一大损失。

我在与这位诙谐幽默、善言健谈的长者关于瑞士德语文学的交谈中，感受到他对世界的热爱，尤其是对中国的热爱，从 20 世纪 80 年代访问中国之后，他便不断地关注中国，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的日耳曼学者和外国文学爱好者交流。我从他身上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世界情怀”，也许这是他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积极地活跃在拉丁美洲、东南亚等地，从事采访和写作而留下的“痕迹”，或许这种“痕迹”也代表了当代瑞士德语作家的某种共性。

然而，罗切尓是瑞士社会政治舞台上最后的勇猛斗士。今天的瑞士德语作家已经远离了迪伦马特和弗里施对瑞士本土的政治敏感和社会批判。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人类今天和现在对历史的文化记忆，他们关注主体个人生活的本身，而且是一种超越瑞士疆域的跨文化生活本身，关注人类共通的主体间情感与交往经验，关注对日常琐碎生活程式的反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托马斯·霍利曼 (Thomas Hürlimann,《四十朵玫瑰》,2006)、克里斯蒂安·哈勒 (Christian Haller,《好年代》,2006)、乌尔斯·费斯 (Urs Faes,《爱情档案》,2007)、阿道夫·穆斯克 (Adolf Muschg,《孩提婚礼》,2008) 等。

2009 年，伊尔玛·拉库萨 (Ilma Rakusa) 发表了小说《更多的海》，并且获得了当年的瑞士图书奖。这部小说采用了碎片和断章的方式回忆了作家在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的童年生活，随着家庭的迁徙，拉库萨的小说犹如茨冈人的大篷车，载着她的遭遇、记忆和情感走遍了欧洲各国，布达佩斯、卢布尔雅那、德里雅斯特、苏黎

世,以及她在巴黎、彼得格勒的学生生活。“我是一个永远漂流的孩子。”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了拉库萨默默眼神中流露出来的对陌生人的新奇和恐惧。

这种对个人经验的关注也表现在这套“瑞士当代小说译丛”所精选的作家作品中,比如彼得·施塔姆(Peter Stamm)。我是在瑞士“罗伦译者之家”认识施塔姆的,在译者与作者交流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在阿尔卑斯山的冽冽寒风中一起抽烟,因为“罗伦译者之家”是高科技环保建筑,所以我和他只能融入大自然了。他的口音似乎并不太瑞士,这大概是因为他曾在纽约、巴黎、柏林、伦敦等地居住多年,那些天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瑞士童话《海蒂》的话题,因为他自己曾改写了一部图文并茂的现代版《海蒂》读本,他对《海蒂》在中国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表示出惊讶。施塔姆第一部小说叫《阿格尼丝》(1998),次年这部小说就获得了奥地利萨尔茨堡劳利泽文学奖。2006年,他的小说《如此一天》问世,同样获得很大的成功,被先后译成五种文字。

《阿格尼丝》以美国为叙述地,用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了“我”与美国女孩阿格尼丝之间发生的个人恩怨与情感。小说所关注的是写作与现实、文学意念与生活真实的双重性,以及个人情感与理性、责任的关系。作者以非常洗练的语言,独具一格的构思,使现实与虚幻随着主人公“我”的“小说创作”而交替变换,让主人公自私的灵魂不断接受着严酷现实的拷问。长篇小说《如此一天》是施塔姆的又一部重要作品。故事围绕客居巴黎的瑞士籍德语教师安德利亚斯与几位法国女人之间展开。作者再次娴熟地描写了爱的无力、主体的苍白以及个体对伟大感情炽热的渴望。

我和莫妮卡·施维特(Monique Schwitter)也是2009年初春在瑞士的“罗伦译者之家”相识的,当时她挺着大肚子,我很难想象她竟是著名的汉堡大剧院的话剧演员。我们一起谈论她的创作和作品,谈论她的《耳朵没有眼睑》。说施维特是瑞士人我开始几乎都不相信,因为她的口音显然是汉堡的,只有她在跟瑞士同乡说话的时候,她说一口我完全听不懂的瑞士德语。施维特35岁的时候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假如在鳄鱼边上飘雪》(2005),就像她的演员职业一样,施维特的作品中具有强烈的角色戏剧性,她总是把叙述主体打扮成各种各样的人物,或者戴上各式各样的面具,采用各种叙述视角的转换,在文学这个世界大舞台上表现着日常生活的细节。我在阅读中常常想起罗伯特·瓦尔泽和他的小品文,毫不奇怪,她的《假如在鳄鱼边上飘雪》2006年获得了罗伯特·瓦尔泽文学奖。看来她喜欢在书名上做文字游戏,鳄鱼生活在不下雪的地方,这点是常识,假如鳄鱼见到了大雪,那么这条鳄鱼一定是在动物园里,一定是在桎梏之中。同样,她的长篇小说《耳朵没有眼睑》(2008)也是表达了叙述主体的生存桎梏,表达了叙述主体如何对生活真谛的探索和对个体自由和解放的渴望。小说采用侦探悬念的手法和元叙事方式,描绘了苏黎世普通人的众生相,表面的日常生活如爱情、同性恋和人际交往掩饰下的吸毒和凶杀。我们相约2010年在杭州再见,并带上她那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她答应了。

记得和罗尔夫·拉佩特(Rolf Lappert)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浙江大学的灵峰山庄,当时他受我之邀来给浙大德语专业的学生讲学,朗诵他的小说片段《游泳回家》。那是2009年5月的一天,为了给

他接风，我去敲他的门，他穿着睡衣出来开门，长途跋涉给他留下了一脸疲倦。我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原来他和许多瑞士德语作家一样，也是一个世界公民。他曾经在巴黎生活多年，周游亚洲和加勒比海国家，2000 年后在爱尔兰的港口小城利斯图威尔定居。拉佩特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小说《接下来的那些日子》(1982)、《路人》(1984)、《走失者之歌》(1995) 和诗集《旅馆房间里的浪漫》、《泳者的视野》(1986)，拉佩特的代表作是鸿篇巨制《游泳回家》(2008)，这部小说 2008 年虽然进入了德国图书奖的最后竞争，但未能折桂，然而几周后，小说获得了同年瑞士图书奖。小说叙述了离开家园后的个体对精神故乡的向往，小说以幽默、冷峻的语言表达了当代瑞士德语作家的共同话题：寻找自我，在日常的生活话语中寻找自我。小说以少年维尔伯的成长过程为线索，以多种叙述视角和时空变换，表达了成长中的少年对自身的困扰和对世界的疑惑。

时隔一年后，也是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陈壮鹰、陈巍又一次来到了阿尔卑斯山上的“罗伦译者之家”。在那里我们又结识了两位青年瑞士德语作家，丹尼尔·戈奇 (Daniel Goetsch) 和卢卡斯·贝尔福斯 (Lucas Bärfuss)。戈奇在我眼里是一个非常典雅的欧洲人，他在苏黎世长大，却来自我客居 13 年之久的德国首都柏林，鉴于我们俩共同的柏林情结，我显得有些激动，但他的谈吐似乎过于腼腆。我们围坐在“译者之家”面朝阿尔卑斯雪山的大客厅壁炉跟前，热烈地讨论着他的长篇小说《本·卡德》(2008)。客厅整面的落地窗外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娓娓地给我们讲述着这部与他的家族历史相关的文化记忆小说。《本·卡德》反映了有着非

·洲血统的卡德家父子两代法国人对伊斯兰文化的情结,小说通过两条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的叙述路线,营造了凝聚在叙述主体身上的西方与东方、历史与现实、虚幻与真实二元相悖互动的现代主义文学叙述架构,表达了殖民、权力、种族、性别范畴内的文化话语冲突,以及作者对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困扰和焦虑。戈奇的另一部小说是《沙心》(2009),写的是一个联合国观察员弗兰克在阿尔及利亚西撒哈拉沙漠难民营的经历,来自发达国家的男男女女与西撒哈拉难民、贫困、毒品、娼妓、黑市相遇,理想和希望在沙尘暴中遭到颠覆。东克尔的出现唤醒了弗兰克对美好爱情、对过去的生活记忆。理想只有从自身的经历中才能感知,这是弗兰克在记忆中获得的认知。

与戈奇不同,贝尔福斯却给人一种风风火火的感觉。他以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头发似乎特意有点乱,西服里面穿着色调极不般配的运动式翻领毛衣,一边的领子永远是翘起的,说话时苏黎世口音分外浓重,他那敦实的形象让人感觉与他的名字本意很符合——“熊爪”。他告诉我,他是图书商出身,读的是职业学校,成绩平平,后来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剧作家或者作家,于是就成了剧作家,写了小说。他觉得自己会成功,于是就成功了。他觉得他的艺术道路就是那么简单。贝尔福斯的代表作是《百日》(2008),这部小说使他一举夺得2009年瑞士席勒文学奖和2009年雷马克和平奖(特别奖)。《百日》也是一部非洲小说,据贝尔福斯告诉我,他曾经非常向往美丽的卢旺达,因为他儿时曾在课本中认识这个风景如画的非洲国家,后来他去了卢旺达,却被那里的政治动乱、贫困和腐败、民不聊生的景象所震惊。他的处女作

《百日》描述了瑞士援非人员大卫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所见所闻，他与胡图部落女人阿伽特的情爱以及他在 1994 年卢旺达胡图与图西种族大屠杀中的经历。美变成了恶，善行变成了兽行，女人成了疯狂的屠夫。小说在 80 万生灵涂炭的血河中反思、拷问、批评了西方彻底失败的援非政策，对西方价值观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的权力话语机制，对因此而歪曲了的人类道德理性提出了质疑。

近年来，瑞士当代德语文学似乎显现出一种总的趋势。首先，文化记忆成为作家们所喜爱的创作主题，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作家几乎都在关注着集体和个体的文化记忆问题，他们的作品似乎都在与遗忘进行着抗争。他们所展现的文化记忆有些是历史政治事件的具体折射，有些则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点滴经历。他们的作品几乎都远离了政治说教和宏大叙事，而常常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日常的生活细节，去反思主体的人生经验。其次，这些作家已经无意识地显示出罗切尔意义上的“世界情怀”，他们的作品写的往往是显微镜下的局部，或者甚至是细部，但是所放大的却是人类伦理的严肃问题，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因此也是严肃的。

是为序。

另：值此“瑞士当代小说译丛”出版之时，我谨代表译者向瑞士文化基金会、柏林文学研究会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浙江大学 范捷平

炽热的火焰 (译本序)

2009年7月笔者参加德国歌德学院在柏林举办的德语教师教学法培训班,一个礼拜天下午应邀前往万湖畔的柏林文学研究会(LCB),参加正在那里举办的德语国家小型文学出版社展览会。从2005年开始,每年初夏时分柏林文学研究会都会特意在自己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内举办小型文学出版社展览会,并且同步安排这些出版社的招牌作家朗诵他们的作品,因此吸引了柏林附近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可惜那天通往万湖边的轻轨七号线正在维修,我们只得在韦斯特克罗伊茨(Westkreuz)站转乘公交车绕了很大一圈之后,才在邻近黄昏时分赶到柏林文学研究会。夏日的柏林天黑得晚,夕阳西下的万湖显得分外美丽与娴静。这种舒适的氛围强化了文学独特的魅力。虽然此时朗诵会已过大半,但仍然可以看到众多文学爱好者悠闲地围坐在研究会主楼后面的大草坪上,啜饮着啤酒或者咀嚼着零食,饶有兴致地倾听他们喜爱的作家的朗诵。

柏林文学研究会的主任雅内茨基博士看见我，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他先请我品尝那里独特的面包夹碳烤香肠，然后递给我一杯鲜啤酒，领我来到他那间面朝湖泊的宽敞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聊起了中瑞文学交流项目的进展情况。他告诉我，这里正在举办德语国家小型文学出版社的展览会，其中也有来自瑞士的出版社。他专门喊来了同事托斯腾，让他领我参观楼下大厅的图书展览，并叮嘱特别要去瑞士出版社的展台看看。

在瑞士比尔格出版社的展台前，参展人员热情地向我推荐了几本书。其中一本红色非洲岩画衬底，烫金标题的图书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本书就是瑞士作家丹尼尔·戈奇的新作《沙心》。翻开《沙心》，书中一幅法语版的西撒哈拉简图，把我带到了三毛描写过的《撒哈拉的故事》之中。我充满好奇，非常想了解瑞士作家是如何描述令人神往的撒哈拉生活的。比尔格出版社的销售代表明白了我的心思，便把《沙心》和另一位瑞士女作家卡塔琳娜·法勃的短篇小说集《用量观测时间》赠送给了我。从那一刻起，《沙心》宛如一团炽热的火焰，开始在我心中熊熊燃烧，陪伴了我足足两年。

一年之后，《沙心》连同另一位瑞士作家卢卡斯·巴尔福斯的《百日》顺利入选瑞士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中瑞文学交流项目。我也有幸成为《沙心》的译者，在2010年的春节前夕应邀在瑞士苏黎世附近的“罗伦译者之家”第一次结识了该书的作者丹尼尔·戈奇。

丹尼尔·戈奇(Daniel Goetsch)是一位腼腆文静的瑞士人，他乌黑的头发，讲一口夹杂着瑞士腔的德语。戈奇1968年出生于苏黎世，在苏黎世完成法学专业学习获得学士学位后，开始了文学创作。1995年戈奇正式从事写作，他像许多瑞士作家一样选择了文

化氛围更为浓厚、物价水平较为低廉的德国首都柏林定居下来。之后作为新生代作家,戈奇获得了许多文学促进奖学金和瑞士文化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其主要剧作包括戏剧独白《我》,喜剧性悲剧《阿门》,广播剧《旅店有一个洞》等。

1999年戈奇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阿斯巴甜》,又于2004年出版了长篇小说《X》,他的第三部小说《本·卡德》(2006)则把触角伸到非洲阿尔及利亚;讲述了卡德父子两代法国人对伊斯兰文化的情节。

2009年3月出版的小说《沙心》则是戈奇最为成功的长篇小说之一。这是部典型的非洲小说,主人公弗兰克是瑞士籍的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的观察员。西撒哈拉位于非洲西北海岸的领土,与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接壤,1976年以前,一直由西班牙管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均对该领土提出主张,但这些主张遭到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反对。根据摩洛哥政府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的协议,联合国西撒哈拉特派团于1991年9月部署,用于监察停火状况,并且组织让西撒哈拉人民决定该地区未来地位的公民投票。

小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戈奇把一项伟大的政治使命与主人公弗兰克的个人生活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小说一开头就把读者的胃口高高吊起。弗兰克讲述了一场十分悲壮的火葬仪式。他的同事东克尔,一位德国籍建筑师的遗体在点燃的熊熊大火之中化为一缕轻烟,消失在西撒哈拉沙漠的夜幕下。东克尔正是作者所要讲述的故事之源,东克尔带来了回忆,让弗兰克回忆起了自己为何会长期置身于这项“神圣”的联合国使命之中。由于东

克尔在神情举止上酷似一位弗兰克过去的情敌，瑞士政客施泰特勒，弗兰克不由自主地在沙漠营地的枯燥生活之中想起了在故乡瑞士度过的往事，想起了施泰特勒，尤其是此人的竞选助理，与他同居多日的同学，前女友阿尔玛，他如今的遭遇，一切的一切都与他过去在瑞士的生活息息相关。

作者写道：“我们的影子从其上方无声地掠过，记忆的痕迹，暗示，关联到我们，用特定的方式让我们返回那些美好的生活，我们之中的每个人在这儿搁浅之前，都曾这么生活过。”

小说沿着两条主线铺开。一条是弗兰克必须面对的残酷的现实生活。在非洲西撒哈拉一座联合国营地，一群来自富国的联合国观察员，正在全力组织一场全民公决。弗兰克作为其中的一员，经历了数次没有结果的全民公决。因为在这块西撒哈拉土地上两大政治势力互不相让，一方亲近摩洛哥，一方想闹独立，交替变化的选民名单让西方式的民主选举成为了一个巨大的笑柄。

在耀眼夺目的沙漠阳光下，时光如流水。深夜时分，弗兰克来到营地周围一堆篝火前，纵饮海枣酒，麻木地度日。他们这些观察员必须每周向联合国递交一份观察报告。虽然走私、毒品、嫖娼充斥着营地的生活，但由于观察员不允许踏入营地半步，所以对难民营里的真正现实并不了解，他们的每周报告也因此成为一种形容词的替换游戏。

当怀揣大胆计划的德国建筑师东克尔来到营地，搬入弗兰克居住的集装箱之后，生活才再起波澜。弗兰克仔细地观察着这个踌躇满志的邻居：东克尔想要建造一座具有居住价值的难民营。最初他的计划得到了联合国机构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可在残酷的

现实面前,计划一再落空和搁浅。因为东克尔完全弄错了难民们的真正需求,他们中的大部分青壮年在门德斯等观察员的诱惑和开导下,并不想留在家乡。门德斯们在难民营里偷偷开设了一间国际学校,目的是把这些青年人培训成真正的难民,让他们能够去欧洲分享富裕的生活。激情四溢的东克尔在建造难民营的过程中,每天都被残酷的现实抽打,他貌似坚强的外表,开始逐渐坍塌。他酗酒,与营地妓女约会,走私,吸毒,最终走上自杀的绝路。东克尔的死也预示了这项伟大使命的荒谬之处。

东克尔不仅向弗兰克诉说他遭受的痛苦爱情,同时他的言谈举止不由得让弗兰克回忆起他过去的遭遇。这是本书的另外一条线索。故事的发生地切换到了瑞士。弗兰克一再回想起自己与女友阿尔玛共度的美好时光:中学时代的郊游,大学毕业典礼后的疯狂举止,阿尔玛从现存秩序的蔑视者和憎恨者蜕变成屈从于以生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精明助手。与其相反,弗兰克则埋头于学术,为了撰写有关“紧急状态”的论文,陷入了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布下的学术陷阱之中。

两人虽居同一屋檐下,但已是同床异梦。弗兰克对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政客施泰特勒的憎恶与嫉妒,让他再也无法与阿尔玛取得一致,在精神与灵魂上离阿尔玛越来越远。在一个雨夜,他在观看电视时碰巧看到了一场政治脱口秀电视实况转播节目,发现阿尔玛竟然也在现场,便认为阿尔玛之所以疏远他全然是因为这个光头政客施泰特勒,他甚至认为阿尔玛与施泰特勒有不正当的关系,他驱车前往电视转播现场,一时产生了杀人的冲动,但最后并没有付诸实施。在驾车送阿尔玛返家的途中,与她发生了激烈